

上海性与上海经验：探寻上海电影的传统与精神气质

黄望莉 罗子盈

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孵化地和都市现代性的摇篮，孕育了“海派电影”所独有的文化风貌。从《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到《都市里的村庄》《绑架卡拉扬》《股疯》《横竖横》《爱情神话》以及主题纪录片《上海传奇》，再到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一系列上海电影通过影像语言向世界展现出进步的城市面貌和丰沛的城市精神。

经典佳片放送之余，“上海电影学派”建设的相关议题也被着重阐述。作为最具地域代表性的研究工作者队伍之一，上海电影研究学者们就“上海电影学派”建构中有关上海性—上海经验—红色文化等相关议题在不同的媒介环境下展开探讨，以期探讨新时代中国影像研究的深度运用和多元阐释及其启示作用。

上海性：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多维度景观

中国电影实现民族电影产业的拓荒、本土电影类型的形成、电影理论的生发与职业电影人才的登台等发展，均源于上海开埠以来由于现代商业所构建的都市文化景观和现代性精神文化的发展。就像“海派文化”一样，“海派电影”一直被认为语焉不详的概念，却又具有鲜明的被指认的特质。这一特质可以被认为是“上海性”。

陈犀禾教授曾认为，“上海性”需要立足于并依赖于“中国性”层面，但同时也具备其自身所独有的区域文化特点。在影像的表达中，“上海性”兼顾与观众的协商性、上海区域叙事空间的都市性和对市民生活日常性的关照。换句话说，对上海性的理解，需要从这三个维度上展开阐释。

关于上海电影传统与观众之间的协商性，最为重要的体现在于“通俗叙事”的结构能力。笔者曾就中国早期电影的“通俗叙事”的传统和历史脉络展开过探讨，认为中国电影中的“通俗叙事”恰恰是与观众“协商”的结果，也形成了中国百年电影的叙事中的一种“超稳定结构”，从《孤儿救母记》到《一江春水向东流》，再到《鸦片战争》等，至今都是中国主流影视创作成功的必由之路。比如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2012)将情感伦理置于前景，以此来讨论时代背景下的个



电影《爱情神话》真实再现上海城市的烟火气。图为该片剧照。

上海经验：本土文化与“流动性”传播

人命运；张艺谋的《悬崖之上》(2021)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谍战片的通俗叙事模式，并融合了他自己的美学特质，建构了新时代话语体系下新的类型景观。尤其是在电视剧等新媒介的影像生产上，近年来颇受观众欢迎的电视剧，包括《山海情》(2021)、《人世间》(2022)等，无不选择通俗叙事模式来呈现出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张力。

寄居在上海都市空间中的“日常叙事”，则经常被指认为“现代性”的文化表征之一，它既是《都市风光》中的“拉洋片”，又是《太太万岁》《假凤虚凰》《哀乐中年》中的“破涕一笑”。上世纪三四十年来代影像中对唱片机、广播、街区、影院的呈现，无不体现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都市生活的“诧异”性体验。

上海电影的“上海性”区域特质，更兼有“世界主义”的精神气质，从1932年孙瑜早期作品《火山情血》中对于上海空间与东南亚空间的有效嫁接中可以看出，上海影人自然而然所流露出的“世界主义”的视野。同时，外滩码头南来北往的异国他乡的人员流动，更加促使“世界主义”不仅仅是景观，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诉求。正如吴永刚的《浪淘沙》一样，超越上海、超越阶级、关于人类命运的叙事是上海影人所极力追寻的人文价值。

点地说，是流动到香港、东南亚，形成第一批上海影人“南下潮”。

向“西南”进发，是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主流。以袁牧之、吴印咸等人为代表的上海影人“流动”到了延安，成为“延安电影团”的核心骨干，尤其是袁牧之从延安到苏联，“战后”再从苏联回到东北，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创建成长以及我党电影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上海经验”支持。

从抗战爆发，到抗战结束，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上海影人因各种缘由经历了三次“南下”影人潮，上海的电影人才、资金、创作经验等，都有效地促进了香港电影的制片水准，“国语片”的生产无论是题材、类型、经营模式，无不延续了他们在上海创作时期的各种经验。尤其是“左派”影人团体的壮大和不断地整合，使得香港电影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延续了上海电影传统和上海经验，也奠定了其后香港电影“在地化”的基础。

抗战伊始，上海影人基本上有两个流向。一个是转向西南，进入“大后方”，在云贵川陕等地的辗转，宣传和动员全民抗战；一个是转向广东地区，更精确一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将石库门、弄堂、马路、报馆、裁缝店等老上海城市特色细致入微地予以呈现。图为该片剧照。



80年代谢晋的影片《鸦片战争》《最后的贵族》中突然重获“记忆”，置于国际视阈内呈现极具生机的流动性，“通俗叙事”中的“史传传奇”更是上海电影经验的再次显现。总之，中国早期电影人的创作经验，作为“上海经验”随着时间和区域的“流动”而成为华语电影世界的一种文化传承，如香港对上海电影经验的继承使之获得“东方的好莱坞”的美誉，同样也再次形塑了新中国电影的国家叙事。

时代的进步性：“上海经验”的精神气质

上海电影中的“上海经验”还体现在对左翼精神的践行和继承。左翼电影运动改变了上世纪20年代过度商业之风，其影像和叙事美学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型，展现阳刚之美、关注劳苦大众，以及民族主义叙事都成为一种精神力量，在其中发展壮大了的“左翼电影小组”也成为中国电影红色根基。

左翼电影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产生一批成为中国电影经典之作的影片，一批具有强烈战斗性、深刻理论性的文献和论著，更在于进步电影的经验，即“时代性”的表达。抗战时期郑君里导演纪录片《民族万岁》以民族志式纪实美学，激励着抗战的民众；近些年来，上海出品的《1921》和电视剧《破晓东方》等作品在进行革命叙事的过程中，重视“上海性”的挖掘，在重塑上海景点空间、挖掘传奇叙事等方面既尊重了历史的真实，也丰富了主流电影的完整表达。

当前，随着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等方面的溯源，中国电影在重视历史、重视文化传统的研究之际，上海区域影像的历史和文化特质得以重新阐释。秉承这一思想，探寻契合自身属性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适应的上海电影的历史叙事，在重新理解中国电影的“上海经验”和“上海性”的过程中，为中国电影如何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更为鲜活的经验。

(作者分别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导；上海戏剧学院在读博士生)

上海美术作为一段软性的历史，隐晦地展现着城市历史遗存中的精神联系，丰富了近代上海思想史的发展脉络。

江南文化对近代以来的上海文化艺术影响深远，在中西融合的新美术思潮中，上海美术的风格受到时代变化的感召，既传承了受江南文化影响深重的海派艺术风格，又在绘画现代语言上进行实验与突破，探寻适合中国的艺术道路。

新时期上海美术又以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中的永恒性和超越性为支点，转化为现代都市中的审美和理想境界，解决都市现代性中人们精神缺失的问题，在都市绘画中实现人文生态城市的理想，建立人们的精神家园。

风格的自律与江南文化“基因”

上海的中国画历史，与上海城市的发展同步。

上海的中国画始于元代，发初于松江。元代松江地区成就最突出的是山水画，当时的元四家绘画活动主要集中在松江地区。松江是国内历史上重要的通商口岸，丝绸、粮食都在这个南北漕运口岸运送，因此周边的画家经常流连于松江地区。松江也因为其发达的手工业、纺织业等，成为上海经济繁荣之地，经济条件与绘画气氛奠定了后来上海绘画的发展。

上海都市题材绘画在近代城市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推动下，在上海都市公共空间中，体现了早期中国现代性的想象。在对现代性的“想象”中，体现了文化启蒙，这种文化启蒙，是带着江南文人气质的新型士大夫聚集起来推动的。上海都市题材绘画中的江南文化基因，是上海都市文化中才子佳人的传统。

如果说上海开埠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分水岭，那么海上绘画则是中国近代绘画的分水岭。上海的绘画在民族美术的传承创新和西方美术的吸收借鉴上兼容并蓄，开拓了中国近代美术多元融合的风貌。

上海画派主要以金石画派为主，金石画派画家和社团活动频繁，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上海书画研究会、豫园书画善会都是金石书画家经常集会、研究与交流的社团。这些社团组织机构健全，经常参与社会慈善，在上海画派之间进行经济上的支持和互助，为上海创建了良好的绘画生态，每个社团也有不同的绘画经营模式，为近代绘画商业化创建了良好的经济生态。

在上海都市形成之前，主宰中国画坛的是山水画，从清代“四王”一脉传承下来的山水画势力的影响遍及江浙地区，后因太平天国战乱，上海成为江浙士绅躲避战乱的地方，因此聚集了大量的苏浙画家，以卖画为生。来自苏

现代上海美术的探索贯穿于文脉传承

陈雨桐



▲陈钧德创作于1978年的油画《上海的早晨》

更偏好装饰性较强的花鸟画和人物画，如骨墨画法的花鸟和带有故事性情节的人物画。在上海市场环境的影响下，工细经营的绘画风格和颐养性情的传统绘画基调无法跟上城市发展的节奏，20世纪上海画坛绘画风格呈现出的世俗化特征显著。

城市题材绘画的审美是伴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发生变化的，在现代商业社会语境中，绘画免不了在“雅”与“俗”之间找到平衡点。新中国成立以后，随城市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城市题材绘画的创作内容更广泛，反映了上海城市的新气象新生活，不少作品都体现了浓郁的人情味和生活气息。尤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现代生活向往的年轻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令人炫目、光怪陆离的景象构成了进入消费时代的现代城市，上海美术创作捕捉到这一根本变化，对艺术形式的探索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成为上海绘画新的突破。

中西融合场域下的现代探索

上海这座城市，既有饱经沧桑的历史感，又

术层面学习；后者则是融合中国文化情景，探索中国现代绘画转型的带有选择和思考的一种文化自觉。

中国本土美术与西方美术的两次交集，都集中在上海，催生了有关中国绘画民族化和中国画出路的思想。由西洋绘画引入而先后引发了写生之争和风格之别，活跃在上海的艺术家和美术社团，在多重风格的探索中寻找中国绘画民族化本土化的路径。

在现代都市景观中呈现超越性

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和典型案例。自开埠起，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就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在“内生外辅”的异质形式中建设与发展。

都市中的景观如建筑、道路、花园等，是自然和人造景观的融合，因实用的需要而创造出棱角分明的大体量建筑，与形态混沌的自然山水，无论是在视觉感受还是在绘画的表现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如何将传统山水对自然的感悟，对天人合一的追求，以及传统山水画中的永恒性和超越性很好地转化成现代都市中的审美和理想境界，解决都市现代性中人们精神缺失的种种问题？那就是通过都市山水画，实现人文生态城市的理想，建立人们的精神家园。

山水园林的自然野趣和工业大爆发的现代性城市，这两个看似在空间和背景上毫不相干的绘画题材，是怎样被勾连起来的？重拾中国城市景观在本土文化的根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都市人精神的栖居，是城市山水之“道”的内核。

上海城市山水画中，城市中的元素作为一种现代符号，运用笔墨的媒介加以呈现，拓展了中国画的宽度，以传统的艺术精神对今天的文化进行观照，传统艺术得到当代转型的出口，当代艺术也因为传统绘画语言的实验越来越具有包容性和可能性。虽然画中景物来自于现代城市，但是山水的当代性的把握，需要艺术家对传统的山水有深刻的领悟，因此不能一味在批判当代的语境下，简单认为传统的山水画无法满足今时今人的审美，无法表现现实主义的风貌和精神。当代都市山水画的创作，要以对传统山水画的深刻理解为前提，思考其中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关系，以传统山水画的思考方式和精神的塑造，来表达现代的都市景观。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助理教授)